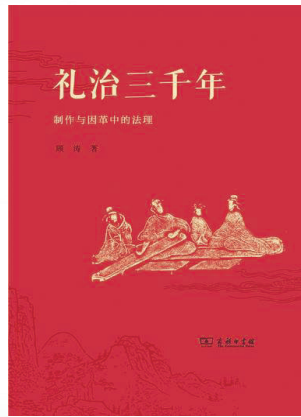




礼治三千年 文明莫与肩

杨 英



《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顾涛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出版。

《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

顾涛先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甫一到手,随即阅读,读来充满感叹和钦佩。我想起李叔同的歌曲“上下五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这“文明莫与肩”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中华有着绵延三千年的“礼”。“礼”在庙堂是各种庄严的仪式,在乡里是淳厚的风俗,更不用说那兰台柱下藏着的浩瀚典籍、殿堂座序中激荡的钟鼓之音,作者此书集结的十六篇论文,上起宗周,下至当下,时段跨度之大,所涉学科之多,驾驭程度之难令人叹为观止。作者此书的学术贡献,就笔者体会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深入考察了“礼”的精神意旨和施政手段。第一篇《礼与法的语源和“经礼为法”的观念形成》在考察“礼”“法”语源的基础上,探求“礼”的精神意蕴及“礼”“法”在三代古典文明的时代浑然一体的关系;第三篇《〈周礼〉的赋税制度及其与法家的关系》对郑玄注所记载的《周礼》三十余个收税职官作了探究,认为周代赋税制度兼综地稅、貢賦、力役等,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控,对叠加在《周礼》赋税制度上的历代诠释迷雾进行层层揭露,是古典经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手段相结合的典范。第四篇《制度史书写的〈通典〉模式》深入探讨了杜佑《通典》继承了“礼”作为“大经大法”的意旨,并以郊天礼记录为例,考察了由“周制”模型、汉唐因革、《开元礼纂类》所组成的三大板块及其在法理依据上的法源,由此形成了以“礼”叙事为风格的《通典》模式,纠正了历代学者将《通典》归入“类书”,并认为“礼”占一百卷、内容过多的认识之失。

其次,作者对三代古典文明中的各种具体礼典进行了详细的勾陈抉发。如第八篇《封禅礼的经学意旨》从对《史记·封禅书》的考证入手,考证了周代封禅作为国家祭祀

系统之顶点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第五篇《古典婚礼根植于人之性情》、第六篇《射以观德的礼义生成》、第十二篇《祭祖的礼仪层次及其与佛教的互渗》,分别考察了古典婚礼、射礼、祭祖礼的结构和礼义旨趣,力求恢复三代古“礼”尊重人的性情的本来面貌。宗周古典文明湮灭之后,“礼”被著于竹帛,从此开始了知识史层面的传承。第十篇《六朝人精于礼学;以何佟之为例》通过深入剖析何佟之议礼的22则礼案,考察了庐江何氏的礼学传承,于是,六朝人精于礼学,学在家族的笼统论断有了翔实清晰的分析,也订正了影响广泛的清人皮锡瑞关于魏晋南北朝经学“中衰”的判断。

再有,作者对“礼”作为齐一风俗、教化乡里的手段,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关注。第十一篇《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考察了周代乡礼实施的真实状况以及“三代之治”为后人追慕的真实原因;第九篇《魏晋以降的礼俗与观念变迁》从貌似小问题的人们坐姿由跪坐到垂足坐的改变入手,考证了魏晋以降坐姿变迁背后反映的社会与礼秩的结构性变迁;第十二篇《祭祖的礼仪层次及其与佛教的互渗》除了考察周代祭祖礼的仪节过程之外,还考察了焚香、素食、斋会、烧纸等有佛教渊源的仪式次第朝向祭祖中的渗透,说明“礼”的体系和仪节实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以上涉及的都是“礼”的古代部分。近代中国的巨变造成了“礼”体系的崩塌,作者对这个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侧面作了详细探讨。首先是“礼”“法”断层。第十四篇《礼法断层的发生学谱系》进入清末制定新律的历史现场,并进而考察了与此有关的两个案例——严复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和日本福泽谕吉对礼教的激烈批判,前者造就了“法”概念在学理上被置换;后者造成了“礼”在彼邦被视为落后的糟粕被抛弃,从此,“礼”“法”概念彻底脱榫,无法彻底拼接,也造成了本土古典法理学资源的湮灭沉睡,有待开垦。

其次考察了“礼教”含义的巨变。第十三篇《百年来反礼教思潮的演进脉络》考察了反礼教思潮的演进。在传统的“礼”的体系中,道德约束及其具体规定即“礼教”可以用刑律来维护,清末新修刑律是为了改变清朝野蛮粗陋、未开化国家的国际形象,但也使“礼教”在近代法理层面变得没有依据,于是被剔除出刑律的范围,其实这个被抛弃的“礼教”并非基于人的性情的周代古典礼教,而是先经历秦政汉治,跟三纲五常合流,再经历程朱理学的阐发和礼制下移,成为国家认可的民间习惯法的“礼教”,离古典时代的“礼教”已相去万里。民国学者唐文治提出“礼教为中国的宗教”,作者在第七篇《“祭为四本”说的结构与指向》中对此予以具体考察,唐文治认为由祭祀而及性理学,再及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即“四本”),与此同时唐先生致力实业,实践了“通经致用”并非停留在文本或思辨层次的理念;第二篇《“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与第七篇旨趣相同,考察了自清末刘师培提出“六经皆礼”到其学生陈钟凡于民国初年撰《经学通论》(1923)、《诸子通论》(1925)对“六经皆礼”说发扬光大的过程,这是学者们努力发掘本土学术资源,在学术上爱国救国的实践。

“礼教”崩塌之后,人们对伦理的认知发生进一步变

化。第十五篇《蒲士性别伦理观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质疑者、著名学者蒲士(Meyrick Booth)《妇女解放新论》传入中国后,催生本土的潘光旦“位育论”的过程。蒲士学说背后有建立在医学、优生学、心理学等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家庭伦理背景,潘光旦则以性心理、人才遗传、社会教育等现代学科的开拓为基础,提出蕴含新的人格论等现代内容的“位育论”。潘光旦还以冯小青为例,钩稽个性体验与婚姻案例。本书作者希望继承此方向,走出“反封建”或“新贤良主义”的简单站队,回到最古典的时代所提倡的“礼教”的真精神中去。

最后,作者对“礼”在乡村治理层面所具有的当下意义给予了关注。传统时代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礼下庶人”之后大量乡绅的存在,然而百年来,乡村先是在水旱蝗灾侵袭和兵匪劳役压榨下不断凋敝;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乡村又在打工潮和城市化等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造就的夹缝中喘息。作者将眼界放到了这一背景下,第十六篇《乡绅之治及其东山再起》从刘庆邦《黄泥地》、贺享雍《人心不古》两部文学作品里描绘的当下乡村故事出发,描述了房国春、贺世普两位“新乡绅”的命运。小说反映的当下农村现实状况,涉及土地产权、家族利益、男女不平等、城乡二元分配方式等或历史遗留、或当下存在的问题,因为国法和源于宗族父权制的乡村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尚未理清;也因为来源于城乡二元制的土地产权、城市工资制度跟基本无其他保障的农民种地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未理清,于是“新乡绅”往往成为这些未理清清楚的关系之间发生结构性冲突时的牺牲品,两部小说中的房国春、贺世普的命运即反映了这一情况。作者呼唤新乡绅的出现,并认为挖掘“礼”中自身文明传统的资源,沟通城乡,是当下治理的当务之急。

以上是本书十六篇的大致内容。全书不仅有“古今如旦暮,别国似乡邻”的巨大时空跨度,更有着令人赞叹的熔古典和现代的学术方法为一炉的学术探索。作者在每篇论文中都显示出了既提纲挈领,又深入具体而微的局部的能力,且能兼跨多种学科,这在目前研究“礼”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礼”的结构本就庞大复杂,它好比是由三代经

混杂,重楼殿宇和断壁残垣共基而生,荒凉枯败和草木葱茏置于一处,需要手持利器,艰辛探索。这一点,作者披荆斩棘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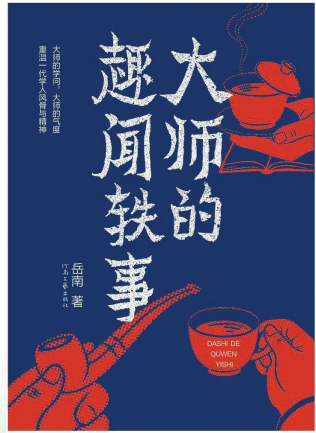
本书可窥见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全书的精细考证俯拾皆是,反映了作者“小学”功底的深厚,第八篇强调“回到汉唐经学现场”是呼唤经史深度结合;其次,还有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分析“礼”“法”关系时需要运用法理学、分析礼俗和治理层面,需要涉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作者第十五篇中甚至提到了“一千件婚恋的微观史研究”,微观史是新史学的一个分支,与其说是作者别出心裁,不如说是慧眼独具,这也是作者呼吁的“礼学的一摊事务”所在。于是,在作者的条分缕析中,“礼”的古典面貌和近代嬗变,以及其中各层面如棱镜般折射出的各种事相自然而然呈现,古今人物,经师巨擘跃然纸上,可以看出作者结合中西古典学,出入经史,构建礼学的现代学术体系的孜孜努力和良苦用心。

当然,作为一部时段跨度巨大、内容兼顾众多的作品,瑕疵肯定是难免的,依笔者之见,最大的不足是对经学史较多倚重,“回到历史现场”尚可进一步加强。在现代学术方法下,对“礼”的研究,应将经学中层层叠加的阐释逐层剥离,真正回到三代历史场景中去,抽绎出真实的“三代之治”和“礼”之中的理性辉光,让它照亮后人,并跟现代文明的辉光真正相映,只有这样,“礼”才不再是腐儒们的千年陈梦,也不至于像列文森说的那样“博物馆化”,而是从学理、制度到治道人心的再一次生机焕发,“中外大同”才不再是纸上谈兵,这也正是作者期待的“需要将历史学研究充分发挥‘学究’的精神”,作者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踏踏实实,构建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一点,我们都正走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感受一代大师的精神高度

碎 碎



《大师的趣闻轶事》,岳南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岳南的新书《大师的趣闻轶事》,聚焦一批大师级人物,如闻一多、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鲁迅、钱穆、梁启超、吴健雄、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傅斯年、林语堂、胡适、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通过他们的生活细节、处世态度、襟怀格局、学识修养、师生情谊、人生抉择等方面的故事,生动表现大师们的性情趣味、气度风骨与人格魅力。近300篇的故事,每篇的篇幅都不长,以平实晓畅而又通达的笔法简要呈现事实本身,几乎不做臧否评判,而人物的格调气韵自然浮现,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回味的空间,可谓一部现代版的《世说新语》。

《大师的趣闻轶事》的体制轻盈精巧,立足于以一些生活细节体现人的温度,以几个人生侧面去彰显人的精神高度,以他们的一些言行展露其心胸格局。篇幅短小精悍,却又是对这些人物质本质化和内在化的呈现。比如,书中《张伯苓的倒楣观》一文里写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父亲在他幼时即言传身教:人愈倒楣,愈当勤剃头、勤打扮。所以他兴办学校之后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居家,都穿戴整齐,打扮庄重得体。“他常对师生们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楣,越要面净发理、衣鞋整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这种处世态度,可谓他成事的心法,与当代心理学积极的自我认知与心理暗示相暗合,对于当下的年轻人亦有启迪意义。

书中写到历史学家钱穆经历的一次考试,对于当下教育更是具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启示作用:

钱穆上中学时,有一次地理考试有4道题,每题25分,满分100分。钱穆拿到试卷看到第三道题时很兴奋,因为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

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书,看到这道题后就下笔千里,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而是完全沉浸其中大抒感想,忘记自己是在考场上。当他把这个题答完,交卷铃声响了,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答。按照常理,钱穆只答1题最多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原来负责判卷的吕思勉老师看到钱穆的卷子上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实在难能可贵,吕先生便写了长长的批语,对答案给予高度肯定,破例给出75分的成绩。这件事对钱穆触动很大,一生都没能忘记老师竟敢“越矩”,对自己的偏才给予公开鼓励 and 鞭策。吕思勉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杰出的教育家。他这样的作为,可谓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

这个故

事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爱才、惜才,发现一个人的闪光点,才是教育的真谛和为人师的价值之所在。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校龄仅有九年的西南联大,在8000多名毕业生中涌现了174位中国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学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峰。该书用了很多笔墨展现西南联大以及联大的大师级教授们的历历往事,耐人寻味。比如,那时候校舍简陋,教室是铁皮顶做的矮平房,一遇到风下雨铁皮屋顶就会抖动摇晃,伴有叮叮咚咚的声音,雨声会压过教授的讲课声,老师就干脆跪在黑板上写“停课赏雨”四个字。这种苦中作乐、随物赋形、超然通脱的人生态度,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也许像治学一样重要。

书中展现的这些大师的做人风范,对于今人也极富营养。比如,在梅贻琦眼里,对毕业的学生不计名位一视同仁。被人问及,他说:“各个人的际遇不同,环境有异。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是师生,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那还能算师生吗?那是商贾的行为。”鲁迅去世一个月前的七条遗嘱,看起来朴素家常,极具平常心,却字字耐嚼,表现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深邃认知。胡适与台北街头年轻的卖饼小贩的友谊令人感动,体现出名士身上饱满丰沛的人文精神。哲学教授金岳霖,为知识分子提供的另一条道路既令人解颐,又发人深省: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因为“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是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言行,尽显一代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度。

这部书书写大师的趣闻轶事,不是关于大师的八卦与花边新闻,但也不回避八卦与花边,既有人人景仰的学者风采与名士风骨,也有大师爱恨情仇、文人相轻与恩怨纷争时的细节体现,由此,才组成了大师真实丰富的不同侧面,给我们带来密密匝匝的触动。或许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不知不

(作者为作家、编审,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

当美食遇到文化

袁恒雷



《餐桌上的文化课》,安迪斯晨风著、陈丽丹绘,广西师大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化的发展历史,诸多细节的考订让我们对本已有所闻的典故有了关于美食方面的全新认知。比如“颜回炊饭”,当颜回用甑炊饭的时候,有几粒尘土落到了甑里,于是他就用手把落了尘土的饭捞出来吃了。子贡刚好看到这一幕,误以为颜回在偷饭吃。但孔子相信颜回的人品,认为他这么做一定事出有因。他让颜回把饭进献给祖先,颜回解释了饭里落灰的事情,说不洁净的食物不能进献给祖先,但扔掉又可惜,自己便吃了。书中的美食故事不仅让孔子与颜回等人的形象活灵活现,也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出:“古人用甑煮饭时,很可能不盖盖子。”

食物与人是一直相生相伴的,食物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妙用也令人心生赞叹。在小说中它可以有力推动情节,构成巨大悬念。在随笔作品里,它同样是各类精彩纷呈故事的主角,从而串联起文章的跌宕起伏。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因为牛一直作为耕地的主力,所以吃牛肉是一件风险系数极高

的事。人们只有在牛年老体衰不堪驱使后,向官方申报,经官方检验批准后方可以屠宰。可是老牛的肉质非常粗硬,干枯如柴,吃到嘴里难以下咽。好吃的嫩牛肉必然取自年轻的牛。可为什么在一些小说中会经常看到“来二斤熟牛肉”的描述呢?《餐桌上的文化课》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牛肉,地方官差抓捕不过来,所以民间吃牛肉的现象一直无法禁绝。有些正经经营的饭店、酒馆可能也会卖些牛肉,地方官差在执法时就算发现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先人学会了用火,告别了“茹毛饮血”时代后,饮食逐渐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人们通过对环境的适应,对世界的认知,陆续栽培出各类粮食、蔬菜、水果,养殖了多种牲畜、水产,发现、发明与引进了诸多调料,让餐桌变得愈加丰盈。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发挥自身想象力,把自然界的天然食材、人们种植的食材等,通过烹饪与加工,变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这一切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饮食文化。于是,在《餐桌上的文化课》里,我们随着作者的笔端看到了“南米北面”“荤素搭配”“茶余饭后”“烟火滋味”,无数次口舌生津,无数次惊叹于祖国处处是美食,处处是吃货。

